

长篇小说发展论

● 孙武臣 著

●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篇小说发展论

CHANG PIAN XIAO SHUO FA ZHAN LUN 孙武臣 著

责任编辑：刘明涛

封面设计：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1168毫米32开本11.875印张3插页263,000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36号)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长春市东新印刷厂印刷

印数：1—2,000册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定价：5.45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我国第一本对新时期长篇小说十年集中进行宏观把握和研究的评论专集，它为我们勾勒了长篇小说发展的轨迹，留下了长篇小说新作的整体剪影；也是我国第一本为我们提供十年长篇小说新作篇目的专集。本书为海内外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和学习者，为高校中文系教授当代文学的教师，为图书馆的工作提供了具有历史保存价值的资料。全书内容翔实，观点鲜明，宏微兼具，格局独特。



孙武臣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评论家。原籍河北省景县，1938年生于长春。196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1980年调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分管长篇小说评论工作。1985年先后任《文艺报》社文学评论部副主任、主任。发表各种评论文章近百篇。

可贵的铺路石的评论(代序)

吴泰昌

常可以读到歌咏铺路石的诗和散文，人们赞美铺路石的奉献与牺牲。没有铺路石的奉献与牺牲，我们也就“无以至千里”了。我以为孙武臣的这本书正是一块有份量的铺路石。

我和武臣在《文艺报》共事已近十年，因此，深深知道他为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的评论与研究付出的艰辛劳动。大约没有几个人能象他读过那么多的长篇新作，也没有几个人能象他详尽地提供给我们那么多的长篇创作信息。当然，我不赞成文学的发展是以年度划分，从文章中，也可以看出武臣也不大赞成这样做，但为了总结评论，为了工作起见，他还是为我们不厌其烦地和不厌其详地评述着每一年上百部长篇创作发展的新特色和新问题。读了这些文章不由令人生出好些感慨。他为他人提示出许多评论和研究长篇创作的新选题，而且在他提供的情况和观点的基础上，人家利用这些“干货”润成长文发表了，我们不免为他惋惜，可他却总是无可奈何地憨笑着，似乎竟无“亏”了的神色，最多再说一句：“唉，我没有时间啊……”这是真的，正如他自己说的，他是个疲惫的追踪者。他的目光总要投向不断涌来的新作。我脑海里不知为什么会常常出现：灯下，一摞摞的长篇小说埋没着他的图景。近二年，他心脏不太好，不能不与这苦读苦写有关。

• 1 •

在工作上，我与武臣有长时期的密切关系，他帮助我及时了解了长篇创作发展的动向，除了交谈，阅读他这些文章总大有收获。我算得上是他这些研究文章的忠实读者。我爱读他朴实有据的文章，我以为他的评论文章有着自己明显的特色。

首先，他比别人读的多，也就能比别人更有可能做到“全局在胸”。他的评论优势多在宏观着眼。只要我们读一读他这个集子的首篇文章《长篇小说十年》就不难了解到：他清晰地为我们勾勒了这一文学样式创作发展的轮廓和轨迹；对总体上的成败得失的评价；提出了他的喜和忧。他的宏观评论不仅表现在他对一个时期、一类题材的创作鸟瞰上，而且对一部作品进行分析时，他也总是将这个作品置于同一时期、同一题材的创作发展中论及它的短长。自然，这样的评论路数，可能会带来微观评论的某种程度的不足，但这绝非一条轻而易举之路。对一部作品短短几百字的评论，而且要评到点子上，我认为其难度绝不在一般长文评论之下。武臣收到不少他并不相识的长篇小说作家的来信，感谢他们对他们作品成败的概评。我想，这或许从一个侧面肯定了他的概评的价值。

其次，武臣善于发现和研究新作中的新的特点。他的感觉是较敏锐的，能迅速提出一些创作问题，并初步总结出一些创作经验。例如，大约是他最早在文章中热情肯定《沉重的翅膀》的，他写道：“随着我国在政治、经济以及其它领域中的改革全面展开，这部作品的基本思想将愈来愈显出它的正确性，将会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在指出《冬天里的春天》第一个在长篇创作中运用意识流手法之后，他最早在文章中写道：“长篇小说的作家中急需出一批象中短篇小说作家那样的‘革新手’”。大约也是他最早提出描写地下斗争生活的长篇出现胡编乱造、格调不高的问题和构思的概念化、公式化，并且写道：“这些都是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

歧途，我们走不得！”现在看来，他的诸如这类的意见是经受住了时间和创作实践的检验的。

再次，我特别欣赏这本书奉献给我们一份“新时期十年长篇小说新作书目”。这大约也是全国仅见的，它大大增加了这本书的文献价值和信息价值。这项工作现在一些时髦的评论家是不屑于费时间去做的，但五四时期不少著名的评论家、教授却乐于去认真地做。在时间等于生命的今天，这项繁琐的工作无疑耗去了武臣大量的业余时间和心血；然而，当这个书目方便了阅读者和研究者的时候，也就是一旦实现了它的价值的时候，人们会感谢他的奉献。

文如其人，武臣是个老实、忠厚的人，连他的文笔也是那样老实，甚至使人感到他的文句规范化的有些平板，洒脱不够。读完这个集子，我们会有在理论上缺乏更深入阐述和发挥的不满足。我不想为此辩解，相反，我希望他今后的文章在理论上会多有长进（事实上，这个集子中所收的后期写的文章已加强了理论深度）；然而，我要说，工作性质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他宜于写这一类文章，正如一位探矿者，呼喊一声：这里有矿！于是便又即刻辗转到其它地方，而余下的采掘任务只好由别人去担当了。

探矿者不可少；专事这种铺路石般的文学评论工作的也需有人去做。这样的人不仅需要奉献与牺牲精神，也需要踏踏实实的有责任感的韧力。这是我允诺为武臣这本书写序特别想说的意思。

1989. 7. 23夜

目 录

序	吴泰昌(1)
---------	----------

第 一 辑

长篇小说十年	(3)
——答友人问	
数量猛增, 质量渐进	(12)
——读一九八〇年的长篇小说	
一九八一年长篇小说巡礼	(19)
——兼谈近年的长篇小说创作	
四化召唤作家 作家反映四化	(52)
——兼谈一九八二年长篇小说创作	
追踪现实生活的新脚印	(63)
——评一九八三年长篇小说创作	
生成了新的素质	(89)
——一九八四年长篇小说创作的印象	
平静——繁盛活跃的前兆?	(107)
——评一九八五年的长篇小说	
一九八六年读长篇新作札记	(132)

第 二 辑

简介“茅盾文学奖”和首届部分获奖作品	(147)
--------------------------	-------

长篇小说的一次检阅·····	(155)
读《花园街五号》·····	(160)
造“茅台酒”难·····	(164)
——读《黄河东流去》	
具有开拓意义的《沉重的翅膀》·····	(169)
与时代生活同步的《新星》·····	(176)
农民命运咏叹调·····	(182)
——评冯德英《染血的土地》	
新中国的一代风流·····	(213)
——评长篇小说《北国草》	
再现翻过去了的一页·····	(222)
——浅谈《蹉跎岁月》从小说到电视剧	
两部具有开拓性的作品·····	(226)
——读《神鞭》和《铁床》	
俗中有雅 雅中有俗·····	(231)
——从《风雨姻缘》看我国当代小说创作发展的一个路数	
在历史与小说之间辛勤耕耘·····	(243)
福临本身就是一个世界·····	(249)
——读长篇历史小说《少年天子》	
一定要求真、求新、求深·····	(255)
——浅谈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	
《大地》的主题歌·····	(269)
真实惟难·····	(272)
——读韦君宜的《母与子》	
南洋群岛革命斗争生活的历史画卷·····	(276)

——评陈残云的《热带惊涛录》	
我们需要这样的生活教科书·····	(289)
——读寒风的《中原夺鹿》	
在时代的洪流面前·····	(293)
——读长篇小说《小楼昨夜》	
读《河魂》·····	(300)
读《故土》·····	(302)
读《古船》·····	(304)
附录:	
1977——1986新时期十年长篇小说新作篇目辑览	
后记·····	(309)

第一辑

长篇小说十年

——答友人问

问：长篇小说往往是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学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对我国新时期十年的长篇小说创作的评价似乎存在分歧，不知你的看法如何？

答：作为长篇小说的概念，在世界尚无一个相对统一的认识之前，我认为中、长篇小说都可以作为这种标志的一个重要方面。诚然，仅从字数的多少去标示中长篇的区别是不行的；但为了研究、为了评奖，我们又不得不划定一个字数标准。例如，我们进行的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工作就要求12万字以上才可称是长篇。这些年来，我们的小说出版界大体上是以这个标准划分中、长篇的。

根据这个标准，我每年都编辑一个长篇小说新作篇目，粗略统计：十年的数量是1500部左右。这就是我们观察和评价新时期长篇创作的唯一依据。由于工作需要，我也算是有的同志称之为读长篇的一个“专业户”。十年中，我读了大约有200部，占总数的七分之一。从评论的角度看，我阅读的范围似乎没有重大遗

漏。即使如此，我对自己有否发言权，仍觉得有点玄！

我总体评价是：喜忧参半。我既不赞成“长篇小说创作已经繁荣”的意见，更不赞成有的同志把新时期整个文学（自然也包括长篇小说）创作贬斥到一无是处的看法。我觉得用“方兴未艾”来概括新时期长篇小说的创作实绩似乎更准确一点。

问：你能否谈的具体一些？

答：先谈喜吧。我不想重复“题材扩大了，主题深化了，手法多样了”等等已成的套话；但是，长篇小说创作也如同整个文学一样，发生了从禁锢到开放，从单一到多元的嬗变。不是吗？打碎了政治禁锢，文学才真正获得它独立存在的地位，才能走向开放的世界。开放就意味着它表现领域的扩大，意味着选择表现对象的自由。其结果必然是可喜的题材多样化和主题多义性。文学不仅可以外向的再现，而且也可以内向的表现。从政治到经济、从历史到文化、从自然到生命、从精神到心理，文学的矿藏永远开掘不尽了。尽管这十年文学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然而，大体上说，文学创作还是获得了十七年不可获得的自由环境；而长篇小说创作的繁荣较之其它文学艺术门类，似乎更需要这一自由安定的环境。除此之外，作家们还获得了一个更重要的自由，即创作主体的觉醒与解放。这也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没有这个觉醒与解放，作家的创作思想，是不可能“冲破思想牢笼”，不可能冲破旧的艺术思维定势，从而获得艺术思维的自由，而没有这个自由，即使具备了环境自由，作为作家也并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创作自由。

从文学不再是政治的附庸，回归到，它自身和创作主体的觉醒与解放这两点来说，我认为说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的整体实绩还没有超过“文革”前十七年的意见是不可思议的，我实在不敢苟同。绝非套话、空话、大话：新时期十年的长篇小说创作是建国

以来成就最大的时期!

评价一个历史时期的创作如何，总是要看它的代表作质量如何。“十七年”的代表作诸如“三红一创”(即《红旗谱》、《红日》、《红岩》和《创业史》)和《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三家巷》、《苦菜花》、《上海的早晨》等，在当代文学史上的确应该大书一笔的。作家们在战争岁月蕴积的斗争生活的激情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还来不及得以喷涌，来不及经过沉淀，来不及写作。而等到我们年轻的共和国成长到了十岁的时候，这些作品如同井喷一样地冒了出来，它们在共和国的蓝天下显得格外耀眼，一时间，它们形成了当代文学的第一个高峰。这样的评价是毫无疑问的。只是我觉得如果把它们视为不可逾越的高峰，观点似乎就带有形而上学的偏颇了。因为任何高峰都不是绝对的，它们只是相对的，也就是说，这批作品不可能不带有那个年代的烙印，不可能不带有那个年代的历史局限性。而这些局限性随着时月的流逝，愈发显得清晰了。战争年月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在建国后依然强调，这就不可能不给作家带来政治禁锢的困扰，使得他们的主体意识受到束缚，他们的文学观念是大一统的，他们的艺术思维和创作方法也是大一统的，都不可能脱离政治的指规性。

问：那为什么这些作品所能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呢？

答：它们之所以在当时能取得那样大的轰动效应，我以为：一是上面我们已谈及的，要写的生活和激情在作家心中蕴积已久，而且又经过建国十年的一段较长时间的沉淀，经过了深思熟虑，思想内蕴一定程度达到了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高度；艺术上也较从容，即使有些章节明显带有图解和演绎的意向，而也因了作者深厚的生活功底，赋予了它们以艺术的细节，写来也显得富有生活气息和生动感人的力量；二是这些代表作的作者之

所以取得成功，正是在某种程度上挣脱了政治观念的束缚，严格遵循了现实主义从生活真实出发的原则，才得以冲破了一些禁区，刻划了一些思想性格丰富与复杂的典型人物；三是以接受美学的角度看，解放初期的读者和作者一样，他们的审美意识无疑也受到为政治服务的指规的影响而显得单一。战争，需要英雄。对英雄的歌颂和仰慕在解放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是作家的比较集中的美学追求。它能激起读者强烈的感情共鸣，引发起他们对亲身经历的那些岁月的回忆。于是这些作品在当时能受到读者的欢迎。

答：你认为新时期十年的长篇代表作是哪些？你怎样评价它们？

问：这个问题似乎是从未讨论研究过，又似乎讨论研究过许多次了。我以为两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评奖工作可能还有不足之处，但获奖作品还是大体上能代表了那个阶段长篇小说创作的成就的）和读者评者普遍给予高度评价的长篇，都可以包括在内。特别要提的是1986年问世的几部作品可以称得上是新时期十年的长篇代表作。这些作品较之“十七年”的代表作有两个重要突破，一个是文学的批判意识；一个是文学对人性、人道主义的自省。当然，这两个重要突破是时代、社会的发展使然。在“十七”年中是不可想象的。然而，现在靠着历史的伟力实现了。“左”的政治发展到极左，其恶果恰恰唤醒了文学对这两方面意识的自觉。“文革”后的文学一边抚慰着伤痕，一边已经开始了反思，而且这种反思愈来愈深刻，由政治到历史，到文化，于是批判意识产生了并逐渐强化了。同时，反思批判的过程，文学也就必然观照人的自身，从被长期压抑和扭曲的人性、摧残人的价值和尊严的现实中，文学又产生并强化了人性意识。批判意识和人性意识一旦成为作家的自觉意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也就走向一

个广阔的世界了。

首届获奖作品《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将军吟》、《冬天里的春天》和《芙蓉镇》对我们那一次次非常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批判，是“十七年”不可思议的。第二届获奖作品《黄河东流去》对我们民族历史、文化、心理的开掘与表现；《沉重的翅膀》结合我们民族历史、文化和心理中的惰力，对改革现实的思考；《钟鼓楼》对市民阶层的大量存在及其素质的表现，揭示我们总体社会生态的景观，这些作品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度，也是“十七年”的作品不可企及的。1986年问世的《活动变人形》对我国封建传统文化的反思，对中、西方文化撞击的思考；《古船》对我们整个民族心态发展史的反思；《夜与昼》对改革大潮起始时，我们国家各层人民所产生的喧哗与躁动的心态进行的全景式的表现，这些作品所达到的思想深度也是“十七年”不可比拟的。此外，所有这些作品不仅表现了人与时代、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与文化、人与自然等错综复杂的关系上较之“十七年”有了超越，而且在开掘人的精神、人的心理、对国民性的再认识、对我们民族在文化制约下形成的心理结构的揭示等方面所取得的实绩，对“十七年”来说完全是崭新的。再加现代主义的引入，不仅使得小说的表现技巧和手法增加了新招数，而且更重要的是启示了我们的作家将人作为艺术思维的中心。于是，我们的传统的现实主义再也不是封闭式了，大门打开了，它自身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从而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即使从现实主义所要求的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一美学原则来看，我认为，倪吾诚（《活动变人形》）、许茂（《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于而龙（《冬天里的春天》）、徐秋斋（《黄河东流去》）、田守诚、高祥（《沉重的翅膀》）、顾荣（《新星》）、曾国藩（《星星草》）、崇祯（《李自成》）等，能否称得上是世界文学之中那寥寥